

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 所藏敦煌文獻小考*

余 欣

2007年11月，我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宗教系講座教授于君方先生 (Prof. Chün-fang Yü) 的邀請，在東亞系和宗教系分別做了兩場學術報告¹。期間趁此機會訪問了東亞圖書館，得到王成志博士 (Dr. Chengzhi Wang) 的熱情接待，並在他的協助之下，閱覽了部分珍本古籍，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發現了4件敦煌寫本。鑒於這一收藏尚不為國際敦煌學界所知²，乃據當時考察手記和自攝數碼照片，撰成此小文，聊供參考。

寫卷現度藏於善本書庫 Special Coll. Room 111 (cage: File Cabinet # 1)，保存狀況良好。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古籍的編目工作仍在進行之中，尚未完成。這四件敦煌文獻在2007年10月29日剛剛錄入機讀卡片，但因為著錄體例不一，並不容易在電腦上檢索到。以下依索書號，分別敘錄：

1. 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 No.9

定名：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九十》

護首題：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九十 廿九 界 十

首題：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九十

品題：處分着不着相品第卅六之四

尾題：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九十

物質形態：卷子本，無軸，以木函盛之，上題經名、索書號，木函當為新製。楮

*本文所用之資料現藏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 (C. V.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, Columbia University)，承蒙館方提供閱覽和攝影之便利，並概允發表，謹致謝忱。

¹Yu Xin, "Sacrificial Money in Medieval China: New Discoveries and New Hypotheses",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, Columbia University, 12 Nov. 2007; "From Turfan to Nara: Figurines Discovered along the Silk Road",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, Columbia University, 15 Nov. 2007.

²業師榮新江教授，曾對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做過全面的調查，著有《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》(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)一書，學界稱便。然未提及哥倫比亞大學之收藏。此書出版已逾十年，部分信息亟需更新，榮師亦久有再出修訂版之意，惟學務繁冗，未遑顧及。小文或可為將來榮師新版大著增一注耳。

紙，上潢。高 26.5cm，長 699cm，有烏絲欄，天頭 3.1cm，地腳 3.0cm。每紙 26 行，每行 17 字。楷書。

考證：護首經名之下“廿九 界 十”，最值得注意（圖 1）。廿九，應指第廿九帙，界應指三界寺，十，指第十卷。即此經為三界寺藏經中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廿九帙第十卷。關於中國寫本大藏經的帙號，方廣錫先生曾做過深入的研究，對漢文大藏經帙號的起源、經名帙號法、偈頌帙號法、千字文帙號法等都有詳密的探討³。但對於數字直接標示帙號的方法，沒有涉及。“界”當指三界寺，而非偈頌帙號法之“界”。因為在偈頌帙號中，“界”為第三十四⁴，而非第廿九。而“界”代表三界寺之略稱，敦煌寫經中極為常見。戴仁先生曾把有敦煌寺院略稱的寫本編製成一覽表，非常便於檢索⁵。其中尤以帶有“界”字或兼有“三界寺藏經”印的寫本數量為最多。例如 S.93 護首題“大般若經卷第九 一 界”，一指第一帙，“界”指三界寺（圖 2）。尾題之後有兩方“三界寺藏經”印，可為印證（圖 3）。卷子本經籍，為便於查找，一般會在卷首背面，即護首外側寫上書名。有時還會做一長條形書簽，貼在護首外側。敦煌藏經洞文獻為我們瞭解這種書籍度藏制度提供了難得的實例。例如 S.6080，上方題“破爛綢錦并夏布零紙”，並標蘇州碼，當出自蔣孝琬的手筆，是文物移出藏經洞時所做的標記（圖 4）。下端用線縫著一小長條形布條“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帙”（圖 5），背書“三界”（圖 6），則應是經帙原有。施萍婷認為“此係千佛洞僧清理物資時之物”⁶，實際上這就是一個三界寺廢棄的帶有書簽的經帙皮。

三界寺與敦煌藏經洞文獻與文物的來源和性質，無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斯坦因最早提出三界寺藏書室的藏書應該是藏經洞文獻的主要來源⁷，藤枝晃先生也持類似看法⁸。榮新江教授在通盤考察敦煌寶藏的基礎上，對藏經洞性質、封閉年代和原因提出了新的解說，並主張藏經洞的主體文獻佛典和供養具，原是三界寺的藏經和資產⁹。因此，三界寺的藏經制度和出土文獻的原始狀況，牽涉到對於藏經洞資料的整體理解，非常關鍵。藤枝晃先生曾經倡議重建藏經洞書庫，頗具卓識，可惜未

³方廣錫《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403-513頁。

⁴同上書，442-446頁。

⁵Drège, Jean-Pierre. *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(jusqu'au Xe siècle)*, Paris: École Française d'Extrême-Orient, 1991, pp.238-245. 限於當時條件，自然有收錄不完全或間有誤錄之小瑕，不足為病。

⁶敦煌研究院編（施萍婷主撰稿、邵惠莉助編）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，190頁。

⁷Aurel Stein, *Serindia: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*, vol.II Text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21, p.822.

⁸Akira Fujieda, “Une reconstruction de la ‘bibliothèque’ de Touen-houang”, *Journal Asiatique*, CCLXIX, 1981, pp.65-68.

⁹榮新江《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》，《敦煌吐魯番研究》第二卷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23-48頁。

能實施。我負笈北大之時，榮新江教授亦有邀我共同參與此項計劃的構想，但茲體事大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克功，後又各有課業，議而未行。此次又涉及到這一問題，再度激起我對重新構擬中古時代圖書館的憧憬。

又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雖為極為常見的經卷，但卷二百九十，此前所見僅為兩件。其一為 S.92，首全尾闕，背面倒書一行“己卯年八月八日宜昌得荊祐成鞋價麥捌斗”¹⁰。己卯年，當為吐蕃佔領時期的 799 年。又有一行，上用紅色蘇州碼寫“××♂”，旁邊有用阿拉伯數字墨筆寫“445”，其下墨筆書“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百九十（亦用蘇州碼）”。這些應當也是出自蔣孝琬之手筆。另一件為北圖藏露 38，也有有首題和品題。以上兩件可以與此互相校勘。

總之，哥大發現的這件，可以確認為敦煌藏經洞所出的原三界寺藏經之一，不僅提供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二百九十的完整寫本，而且帶有卷帙號，為敦煌大藏經的經帙體系增添了新的樣本。

2. 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 No.11

定名：《妙法蓮華經》卷七

首行：或現自在天身，或現大自在天身，或現天大將

尾行：來往品時（下殘）

物質形態：寫本首尾皆殘，末行似用手撕下。以紅色漆盒盛之，再裝入白色紙盒中。僅存 37 行。上潢。有烏絲欄。高 25.2cm，長 48.5cm。天頭 2.6cm，地腳 2.6cm。每紙 28 行，每行 17 字¹¹。楷書。

考證：此經館方定名為“金光明大勝王經”，經與《大正藏》比對，實為《妙法蓮華經》卷七。編目者定名之誤蓋與 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 No.25 混淆所致。

卷首背面有鋼筆書“9:1 C. B. Fahs 1961”，對於寫本來源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（圖 7）。按，C. B. Fahs 應該是 Charles Burton Fahs (1908-1980)，他是日本研究和遠東問題的專家，在 1930 年代擔任過 Pomona College and the Claremont Colleges 的教授，出版過《日本政府》一書¹²。1930-1950 在美國駐日本使館工作，被任命為

¹⁰Lionel Giles. *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*, London: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, 1957, p.8. “祐”字，施萍婷《總目新編》作“祐”，似不確。

¹¹每紙 28 行，每行 17 字，這樣的行款是唐代寫經最為常見的形式，以至於被後世的刻本大藏經所繼承，北方系的代表，山西應縣木塔出土的遼代《契丹藏》就承襲了這種版式風格。參看李際寧《關於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木刻本佛經殘片的考察》，氏著《佛經大藏經研究論稿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7 年，55 頁。

¹²Charles B. Fahs, *Government in Japan: Recent Trends in its Scope and Operation*, New York: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, 1940.

的大使顧問。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是傑出的對日決策分析家。1946-1962 年間歷任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人文分部的助理主管、副主管和主管。後任教於 Miami University。1979 年獲得“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獎”。Fahs 出身於圖書館學世家，他的父親是紐約的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 館長。因此，他從小對藏書很有興趣。在擔任 Claremont College 教授時即致力於東方學的收藏。在 Rockefeller Foundation 任主管時，更推動了多項為圖書館事業提供資助的計劃¹³。所以，我推測這件敦煌文獻有可能是 Fahs 在日本使館任職期間搜集到的，並在 Rockefeller Foundation 任上為表示對圖書館東方學收藏的支持，在 1961 年捐贈給了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。其他三件也有可能是 Fahs 的舊藏品，但因為沒有入藏的原始記錄，暫時無法確認。

此外，寫經僅為《法華經》卷七中間一截，且有撕裂痕跡，估計為昔日書商為牟利割裂一經為數段所致¹⁴（圖 8）。

3. 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 No.25

定名：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卷第三

首行：一心專念，作如是言，我今歸依十方一切諸佛

尾行：說已，咸蒙勝益，歡喜受持。

物質形態：首闕，後半經文完整，然闕尾題。白麻紙，未上潢。有烏絲欄。高 26.9cm，長 336cm。天頭 3.5cm，地腳 4.0cm，行寬 1.2cm。每紙 28 行，每行 17 字。

考證：編目者題為“敦煌唐人寫經 一心專念”，顯然未能比對出是何佛經，因此以首句作為標題（圖 9）。在電子版佛典普及的今天，這類簡單的比對工作，已是輕而易舉之事。但《金光明經》卷三，抄本數目雖較前件《法華經》卷七為少，但敦煌文獻中亦約有百件之多，此件是否可與其他寫本綴合，倉促之間，尚難以遽斷。

4. 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 No.26

定名：《妙法蓮華經》卷四、卷二

首行：尊重、讚歎。爾時寶塔中出大音聲歎言：“善哉，善

尾行：大樂說菩薩白佛言：世尊！我等願欲見世

首行：何用衣食，使我至此？長者知子，愚癡狹劣，

¹³http://goliath.ecnext.com/coms2/gi_0199-6432185/The-International-Relations-Office-1956.html

¹⁴高田時雄先生指出 20 世紀 30 年代，日本售出的所謂敦煌寫本多為偽卷，故此件亦甚為可疑。高田先生的意見，無疑是很值得重視的。然偽卷之判斷須考慮多方面因素，目前無法確證，不宜斷言，姑且存疑。筆者對於敦煌寫本真偽判斷的看法，請參看拙文《浙敦 065 文書偽卷考——兼論敦煌文獻的辨偽問題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02 年第 3 期，41-47 頁；《敦煌寫本真偽辨別示例——法成の講じた〈瑜伽師地論〉の學生による筆記として》（與榮新江教授合撰），刊石塚晴通教授退職記念會編《日本學・敦煌學・漢文訓讀の新展開》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05 年，61—72 頁。

尾行：我等雖說，佛法寶藏，自無志願，亦復如是。

物質形態：此寫本實為兩截《法華經》殘卷用中國書畫裝裱方法裝成一軸。第一部分為《妙法蓮華經》卷四，為完整的一紙，可見明顯紙縫。楮紙，上潢。高26cm，長49cm，天頭3.4cm，地腳2.5cm，行寬1.8cm。第二部分為《法華經》卷二，一紙又一行，長50cm，高同，天頭、地腳與前者有參差。

考證：兩部分，紙張、墨色、字體相近，或為同一部經之不同卷之殘葉。編目者失察，誤將首三字“重讚歎”擬為標題，實為破句，當句讀為“尊重、讚歎”。此種裝裱方式，當是書商或某一收藏者所為，其他敦煌散藏中亦屢見。其中第十行天頭上寫“欠一行”，在第九和第十行之間，插入一行“發是音聲？爾時佛告大樂說菩薩：摩訶薩，此寶塔中”，應是勘經者所補（圖10）。又，此句較《大正藏》本多“摩訶薩”三字。按，摩訶薩菩薩，名大樂說，今本所闕三字，當為佛發言稱呼，較今本為勝。故此古本雖殘甚，仍有校勘價值。又，其書法較為古樸，字體略帶隸意，或為唐初之抄本。

小結

藏有漢籍的各個東亞圖書館，遍佈全美，其藏品數量和質量都不容小覷。不過，目前正式出版過書目的只有國會圖書館¹⁵、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¹⁶、普林斯頓葛思德圖書館¹⁷、加州大學柏克萊圖書館等¹⁸。其他收藏往往既沒有完整的目錄，也沒有經過學者的深入調查，只有一些概述或經眼錄之類的文章對藏品有簡略的介紹¹⁹。但多出自圖書館學或目錄版本學專家之手，偏於“善本”之著錄，對於歷史學界而言，其整體文獻狀貌和學術價值往往難窺其詳。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發現的敦煌文獻提醒我們，除了較為重要的普林斯頓葛思德特藏之外²⁰，在美國可能還有不少零星

¹⁵王重民《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》，國會圖書館，1957年；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¹⁶沈津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9年。

¹⁷屈萬里《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4年；葛思德東方圖書館《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中文善本書目》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0年。

¹⁸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《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。

¹⁹例如：吳文津《書林攬勝：臺灣與美國收藏中國典籍文獻概況——吳文津先生講座演講》，臺北：學生書局，2002年；沈津《書城風弦錄——沈津學術筆記》，南寧：廣西師大出版社，2006年；周原《美國大學中的東亞圖書館》，《大學圖書館學報》第23卷第6期，2005年11月；14-24頁，等等。

²⁰相關介紹見F. Mote, “The Oldest Chinese Book at Princeton”, *The Gest Library Journal*, I.1, 1986, pp.34-44; J. O. Bullitt, “Princeton’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-huang”, *The Gest Library Journal*, III.1-2, 1989, pp.7-29. 2007年11月18日，余赴San Diego出席AAR (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) Annual Meeting之時，陳懷宇博士面告已完成葛思德敦煌文獻特藏的整理，不久將以館刊特集的形式公佈材料和考證。而據裴德生教授 (Prof. Willard Peterson) 托左媼轉告，普林斯頓圖書館正在將這些寫本掃描，將來會上網，以利學界使用。此二則消息誠為振

的搜集品的存在。相關的調查亟待展開。

孤立地看，這些敦煌散藏，只不過是普通的寫經，沒有太大的學術價值。但是對於重構敦煌藏經洞原貌，以及整體上研究中古大藏經史和書籍文化史，進而探討寫本時代的知識社會史²¹，仍是有意義的。

對於哥倫比亞大學藏品的考察，竟然發掘出一樁塵封已久的中、日、美文化交流的往事，感受到愛書人 Fahs 先生對東方學事業的熱心，對古文獻的溫情與敬意，亦堪稱為國際敦煌學學術史再增添一段佳話。

奮人心之佳訊。

²¹參看拙文《寫本時代知識社會史研究——以出土文獻所見〈漢書〉之傳播與影響為例》，《唐研究》第13卷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12月。



圖 1：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 No.9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第二百九十護首（護首題簽字體與經文不同，經文似更為古樸。此或為道真所蒐集之古舊佛典抄本之一，護首乃入藏三界寺後所加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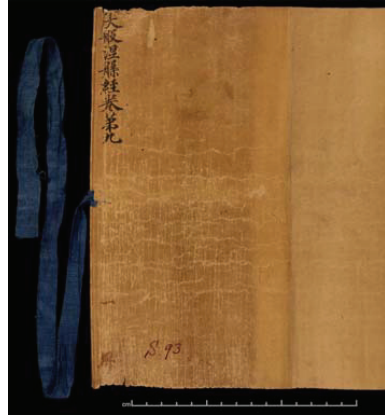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：S.93《大般涅槃經》卷第九護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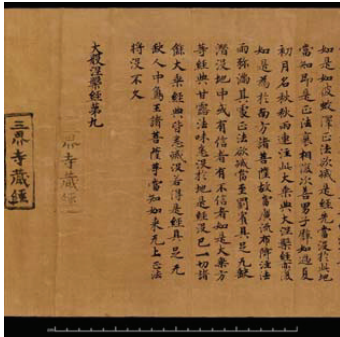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：S.93《大般涅槃經》卷第九卷尾“三界寺藏經”印



圖 4：S.6080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帙》經帙全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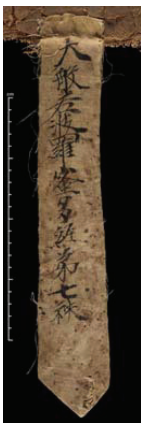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：S.6080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帙》經帙書簽正面特寫



圖 6：S.6080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帙》經帙書簽背面特寫



圖 7：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 No.11《妙法蓮華經》卷七殘卷背面鋼筆記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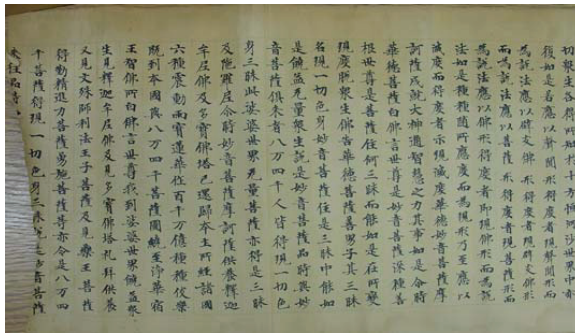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 : 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
No.11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七殘卷尾部割裂痕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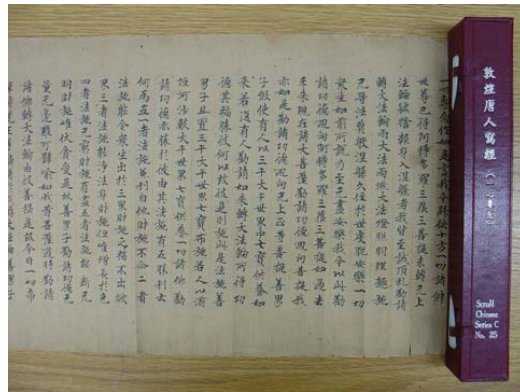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 : 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 No.25
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卷第三殘卷首部及館方新製經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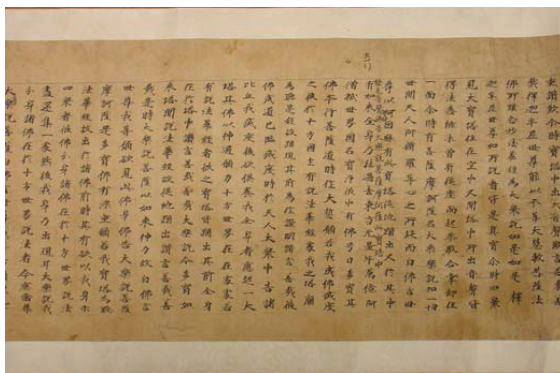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 : SPECIAL COLL. Scroll Chinese Series C No.26
《妙法蓮華經》卷四、卷二殘卷（經現代重新裝裱，卷四中
段有勸經者補記）